

現階段共匪的「紅專教育」政策

汪學文

一、現階段共匪的「紅專教育」政策

(一) 共匪對「三過思想」的批判

所謂「三過思想」，就是「政治上過得去，業務上過得硬，生活上過得好」，據共匪供認這種思想在大陸很流行，不僅在大學師生中有，而且青年科學技術人員、青年文藝工作者以及其他青年知識份子中也有。在大學中的口號是「政治上過得去，學業上過得硬，生活上過得好」，雖然「學業」與「業務」這兩個名詞有異，但彼此之意義與作用却完全相同。

「三過思想」乃是今日大陸青年思想的典型，其與「三院思想」、「四向四不向」、以及「兩架發動機思想」却有歷史的淵源或相互的關係：

所謂「三院思想」，最初係指北平某學院畢業生的志願而言，因為他們都希望到「科學院」、「設計院」工作，或者留在「本院」任助教，而願到廠礦去作實際工作的人却很少。四十六年暑假以前，「清華大學」會對某班將畢業的學生作過一次志願調查和統計，結果也和「三院思想」差不多，有百分之五十願到「科學院」，百分之二十願到「設計院」、百分之二十願留校任助教，只有百分之十願去工廠參加實際工作。共匪認為這都是「政治思想覺悟問題」，並且指出：「有不少的青年，等到專了就更不願紅了」（註一）。

「四向四不向」與「三院思想」是有連帶關係的，當共匪分配工作時，大陸青年畢業生都希望「向上不向下，向大不向小，向城市不向農村，向南方不向北方」。不過無論是「三院思想」也好，「四向四不向思想」也好，都僅是大陸知識青年們心中的一種想法而已，這種想法無異幻想，是很難實現的，因為共匪是根據「國家需要」來作「全面考慮」的，「祖國需要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」，「你們應該服從分配」（註二）。

至於「兩架發動機思想」就是「既為祖國又為個人」思想，其與「三過思想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且更具有影響力，據「清華大學」學生葉志江說：

「只為個人太可恥」，「只為祖國又太空虛」，如果兩者兼備的話，則既可「威力無窮」，又可「心安理得」！不過實際上，「由於個人名利思想是永遠滿足不了的，真正起作用的總是為個人名利的一架發動機，為祖國的那架發動機只是招牌而已」（註三）。

從大陸青年思想的演變來說，「三過思想」實係淵源於「中游思想」，「中游思想」乃是大陸青年消極抵抗共匪「鼓足幹勁、力爭上游的大躍進路線」的態度。中游主義者認為「上游冒險、下游危險、中游保險」，因為怕「爭上游容易犯錯誤，在下游容易受批判，只有穩居中游最好」。今日的「三過思想」顯然也就是「不過問政治」的「中游思想」，而這種「中游思想」較當年更為普遍，在農村，青年們大都只希望各有「三分自留地，五隻老母雞，一雙好夫妻，二個小把戲（子女）」；而在城市中，祇要能够「白天一起去上班，晚上回來聽聽音樂，看看小說、讀讀詩、看看電影，星期天上公園，或者找幾個朋友聊聊天……」，青年們就心滿意足了。其目的均希望找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，以躲避「階級鬥爭」的風暴，逃避「思想改造」的迫害。然而這種意境既不可得，這種思想也不准有，否則便到處碰壁，隨時受批評。共匪會聲稱：「階級鬥爭不因你害怕而就不找上你的家門……；小天地的陰晴風雨都受到大天地的氣候影響，『小天地觀』者視而不見，只有碰得頭破血流而已。」（註四）

「三過思想」既為今日大陸青年思想的典型，其遭共匪之批判乃是必然的，共匪會指出：「三過思想」的核心是一個「個人主義的黑線」，「政治上過得去」只是一個幌子，「業務上過得去」是他們向「黨」和「人民」討價還價的本錢，而「生活上過得好」才是他們的目的，並認為他們企圖以「三過」代替「又紅又專」，實行「和平演變」，因此共匪要採取對策，進行鬥爭。

(二) 共匪「紅專教育」的具體政策

現階段共匪的「紅專教育」政策

共匪「中國青年報」的「又紅又專是時代對青年的要求」的社論指出：目前青年中所流行的「三過」論調，一般說來，大體上可以分爲三種人，也就是三種不同的態度：

第一種是「以『三過』作爲藉口，與又紅又專口號相對抗」；
第二種是「因爲對自己要求不嚴，在政治上麻痺自滿」；
第三種是「由於認識上的糊塗，認爲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天下太平，政治上可以馬馬虎虎了」。

對於前一種人，共匪採取「揭露」的政策，亦即在政治上採取積極鬥爭的政策，以揭露其「虛偽性」；而對於後兩種人，則採取「說服教育」的政策，以糾正其「偏差」，促其「向先進轉向」。實際上，這也就是共匪對羣衆慣用的基本政策，共匪對羣衆一向區分爲「比較積極性的」、「中間狀態的」和「比較落後的」三部份，而以團結積極份子作爲骨幹，去提高中間份子，爭取落後份子。而且不斷地進行這樣的比較區分，不斷地促進中間、落後狀態的人向先進轉化。共匪認爲這樣政策乃是「革命的辯證法」。

同時，共匪特別指出：不論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，「三過」論調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，它的實質，就是「反對知識份子以自己的知識去爲人民服務，要他們把知識作爲追求個人名利的的手段」。如果讓「三過」論調散佈開來，「就會把知識份子引向一個錯誤的道路上」。因此，「對於這樣一種資產階級論調」，必須予以「澈底的批判」。

(三) 共匪對新舊知識份子的差別政策

共匪對待新舊知識份子，向採差別政策，這可從兩方面獲得證明：

第一、在新舊知識份子關係方面，一直處於有隔閡、不正常、不協調的狀態，這主要的是青年知識份子對老年知識份子的知識和經驗不重視、意見不尊重、態度不友善，甚至把老教授們醜化爲善於裝模作樣、抄襲剽竊、吹牛欺騙的一羣人。青年知識份子態度之所以如此驕橫惡劣，無疑的，乃是共匪的差別政策使然。

第二、在研究條件的配備方面，共匪對老年知識份子或高級知識份子，不僅在生活福利上未作適當的照顧，助手配備不能適應需要或付之闕如，甚至關於圖書資料的參考應用，亦有種種不合理的限制。

這種差別政策，共匪在這次「紅專問題」的討論中，始明白地宣佈：共匪視青年是未來和希望，因而培養青年的政策不同於對一般社會人士的政策；對社會上一部份在政治上處於中間狀態的人，是採取「團結的政策」，也就是「統戰政策」。共匪認爲：「爲了革命的利益」，應該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來「爲社會主義服務」。同時，由於世界觀的澈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，對於這些人，就不能要求過急，「只要他們願意爲社會主義祖國服務，就應當調動他們的積極性，發揮他們的作用」。至於對一般青年，則採「教育的政策」。共匪坦白指出「黨對培養教育青年的政策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是有區別的；自覺地爲社會主義服務同不自覺地爲社會服務，又是有區別的。黨把青年看成是未來和希望，要求青年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，以高度的自覺性爲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。」

其實，共匪對於老知識份子，一方面採取團結的政策，以利用其專長，來「爲社會主義服務」，另一方面則採鬥爭的政策，來打擊他們、醜化他們，以免其對社會、對青年產生「不良」的作用和影響。而對於青年知識份子，則一心一意想把他們培養成爲「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」，但是，「三過思想」却證明：大陸青年知識份子大都把「對自己的要求降低到中間狀態的水平上」，而放棄「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高標準」，這不僅令共匪憤怒焦慮，而且感到非常失望！

二、「紅」「專」的矛盾與「又紅又專」的本質

根據共匪的解釋，所謂「紅」，就是「服從黨的領導，忠於社會主義事業，全心全意地發揮專長，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，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。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中，在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和國內兩條道路的鬥爭中，能够站穩立場，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」；

所謂「專」，就是「在練好基本功的基礎上，逐步掌握和精通本專業的理論和技術，切實地、出色地解決我國各方面建設中的科學技術問題，攀登新的科學技術高峯。」（註五）

至於「紅」與「專」的關係，「政治」與「技術」的關係，共匪認爲是

「對立而又統一的關係」，「不問政治，只專不紅，就會變成迷失方向的實際家；不鑽業務，只紅不專，就會變成空頭的政治家」。但是，實際上「紅」與「專」之間實存在着若干的矛盾：

(一)兼顧的矛盾 在「紅專問題」討論中，即有人指出「紅專二者不可兼得」，人的時間有限，精力有限，「又紅又專」做不到。因為「時間是常數，要「紅」就沒有時間去「專」，要「專」就沒有時間去「紅」。」（註六）共匪認為這種論調是把「政治」和「業務」割裂。

(二)輕重的矛盾 這個矛盾包括「重紅輕專」和「輕紅重專」兩個問題，主張前者的論調認為：「革命化是個變質不變質的大是非問題，書讀得不好是個人的小是非問題」，於是有人怕別人批判為個人主義而不敢發憤學習，不敢抱有做「紅色專家」的志願；相反的，主張後者的則認為「只是搞好業務，客觀上也就是為社會主義服務了」；特別是技術人員認為他們的貢獻，「主要憑技術，政治上只要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就行」。

(三)先後的矛盾 在討論中有人認為「專」是根本問題，有了「專」才能「紅」，換言之，就是採取「先專後紅」的態度，主張「三十歲以前抓專，三十歲以後抓紅」，強調「紅是抽象的，看不見也摸不着；知識是具體的，學好了歸自己，誰也奪不去」（註七）。由於專是無止境的，「先專後紅實際上就是只專不紅，就是堅持資產階級個人主義」。

其實，共匪雖然高唱「又紅又專」的口號，但其本質和真正的目的却是着重於「紅」，主張「以紅為主，以紅帶專」，「以政治統帥業務」，以便控制青年知識份子的思想，免得他們因為「書讀得越多，業務專得越精，對勞動人民的危害也越大」。

三、大陸青年的反應與對抗

在所謂「紅專問題」討論中，共匪「中國青年報」特別選刊了兩篇表示反面意見的文章，作為「典型」加以批判，從這兩篇文章中不難看出大陸青年對「又紅又專」的反應與對抗情況：

一篇是偽「北京鋼鐵學院」學生田和水寫的「紅專二者不兼得」（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該報），他在文章中表示：「紅」與「專」在不同的時

期對不同的人物，應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側重。同時必須實行必要的分工，對於搞社會科學、專職搞政治工作的人，「紅」的要求就要高；對於搞自然科學的人，「專」的要求就要高，「紅」的要求就要適當放低一些。人的時間有限，精力也有限，如果要求搞理工的人又紅又專，既通馬克思列寧主義，又通專業知識，實際是不可能的。他並特別舉例說：「據我所知，歷史上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沒有一個是精通馬列主義的」。

另一篇是偽「湖南湘潭電校」學生趙紹忠寫的，他也認為「不必又紅又專，照樣作出貢獻」（五十四年二月十八日該報）。他說：「從古到今，有許多事實證明，不要紅，或者少要紅，照樣能創造發明，作出貢獻。偉大的科學家牛頓不知道什麼馬克思列寧主義，却為人類立了不朽的功德，……人的精力有限，要搞科學技術的又紅又專，就要眉毛鬍子一把抓，勢必相互影響，既不能紅，又不能專，兩方面都弄成半瓶醋」。

上述的代表性的論調，不僅是對「又紅又專」政策的反對，同時也是對共匪全力推行之「學習毛澤東思想」運動的抗拒。這是共匪「紅專教育」的失敗，也是「思想政治教育」的失敗。而這種失敗並非「反覆討論」所能挽救的，因為共匪也深知：「紅專問題」不僅有「認識上的根源」，更重要的是還有「階級的根源」，只要社會上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，還有各種差別的存在，總是會有人提出這樣那樣的理由來反對又紅又專，鼓吹只專不紅。」（註八）

註一 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匪「人民日報」。

註二 參見共匪「中國青年」半月刊五十年第十七期。

註三 五十四年七月十日共匪「中國青年報」。

註四 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共匪「人民日報」。

註五 五十四年五月十九日共匪「人民日報」。

註六 引自錢學森作「又紅又專，為革命利益而攀登高峯」，見五十四年六月五日共匪「光明日報」。

註七 五十四年一月七、十六日共匪「中國青年報」。

註八 五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共匪「中國青年報」。